



官房正面的台门还孤独地矗立着

官房的故事

叶龙虎 文/摄

余姚丈亭上徐塔旧称任徐村，村东有一幢旧称“朝东屋”的乾隆末年的建筑，自道光年间出过一位县官后，一直称作“官房”。官房坐北朝南、前后三进、硬山重檐、穿斗式梁架，东西两边的封火墙基本完好。前进五间两弄，中进已经变卖拆毁，后进四间一弄，每进有前后天井，既相对独立，又有月门贯通。后进的西边少了一间一弄，大概是屋地基的原因，主人曾以为在西边镶嵌一间一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造化弄人，直至房屋倒塌、易主，仍是未竟之业。

与周围的现代建筑相比，如今的官房显得特别矮小、破败。正中的台门孤独地矗立着，砖制斗拱，砖雕门额，正面雕“竹苞松茂”，背面是“光前裕后”，寄托了主人希望家族根基稳固、枝叶繁荣、光耀祖宗、恩泽后人的美好愿望。台门两边的围墙已经坍塌，进门的甬道和两侧的石板也多破碎，长出了齐腰高的荒草。台门外立有一对梅园石旗杆夹，东边一副已湮没在草丛之中；西边一副紧贴着一户农家的后门，其中一块被敲断半截搁上一块石板当作洗衣板。进士匾还在，只是被人改作一扇板门，继续“发挥余热”。堂前里，乱七八槽堆放着各种废弃的如水车、犁耙、稻桶之类的大型农具。左壁贴着两张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支离破碎的纸头，上面字迹漫漶，依稀“钦命”、“捷报”、“高中”等字样。屏风背面贴有一张官报，因板壁改砖壁的缘故，只剩半截，“捷报，贵府令姻再任相公张……”几个字倒还清晰。

陪同的村民告诉我，东边那副旗杆夹的前面，原来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水池，俗称荷包，原本也是官房的私产。荷包地下水脉很旺，无论天气有多么干旱，水池都不会干枯。他说：“荷包的水很深，埠头有十八级台阶，四周有篱笆墙，每遇大旱，官房的主人每隔两天就会打开大门，让乡亲们前来挑饮用水。”

官房的主人究竟是谁？出于好奇，我采访了住在官房西边的任能永老人。老人八十多岁了，记忆力非常好，他告诉我，官房的主人叫任大才，他的儿子任德喧做过广东三水和太埔的两任县官，他本人是任大才的五世孙。接着，他用指头在桌上写出一些名字，能永、汝金、光法、昌奎、德金、大才、仁育，一直写到他的七世祖益生。他说：“我没读过书，这些名字是小时候祠堂里‘神主’上看来的。我小时候还听过爷爷说的一些不为外人知道的故事。德喧公是大才公的第三个儿子，他三岁丧父，他还造过前后两进的‘任家祠堂’。”从老人的嘴里，我弄清了德喧与他的关系，德喧是他高祖父德金的弟弟。老人小时候跟他爷爷光法清明上坟，也要去半亩的德喧坟头。

查光绪《慈溪县志》（以下简称《光緒志》）和《清朝历科进士名录》，清朝267年中，旧慈溪县除了道



从祠堂遗址上望过去的官房

光十五年（1835）三甲第79名进士任荃，再无其他任姓。于是，当我再次询问任能永老人时，老人脱口说出，“你是说张任荃吧？德喧公就是张任荃。”原来，益生本姓张，是任家的螟蛉子，经过几代人的勤劳致富，到了他孙子大才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富裕了，其子个个都读书科考。老人告诉我：德喧公道光十二年秋闱中亚魁，次年春闱落第，光绪十五年考前忽然做了一梦，让他改张姓赴考必中。于是，任德喧改名张任荃赴试，果然中试。当时以姻再任张任荃到任家报喜。”对老人所说的故事，我从《光緒志》中得到了印证：任荃“先世本张氏，自曾祖为任后，荃求归宗不得。既成进士，求复姓于部也不得。”由于吏部不准复姓，只得去掉张姓赴广东三水。

任荃是一位好官，据《三水县志》记载，任荃一到任便倡导捐款，自己带头捐银一千两，筹款二万零八百两用于修缮三水县城及养济院、学校等。《光緒志》也因此有传：“署三水县，事守洁，理积案，多平反。有村农被诬，荃密召农，青衣杂徒役中，示盗，盗妄指他役，荃大笑立释农去。”他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很有一套办法。史书上还有南海侵占三水书院沙地与上司力争的故事，“三水行台书院沙地千二百亩，邻南海见侵夺，讼不得。直荃至，白制府邓廷楨请复按，邓以袒三水。怒之对曰，官三水袒三水情耳。公总制两广，皆赤子，袒南海何也。卒尽返侵地以养士”。一个为民请命，不畏权贵的县官跃然纸上。其在大埔任上辅导当地种桑养蚕的故事，更是造福后人，“大埔地瘠，民妇不知蚕，荃始教之，为作《蚕桑要术》……两县人刻之行于世”。“山中简僻人多古，境内荒凉吏少恩；但得蚕桑勤课，无穷生计溢缗盆。”读任荃存世的《鸿爪集》发现，他当年对其传播的蚕桑业寄予很大希望，试图以此来改变大埔、三水的贫穷面貌。正当他要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不料大埔水灾，任荃体恤灾民，坚拒弄虚作假，不肯与上司同流合污而遭革职。然而，民心不可欺，任荃罢官之后，三水士民力邀他主讲行台书院，因此他在诗中写道：“为吏为师俱可患，何功德永难忘。旧时桃李知无恙，重倚江楼醉夕阳。”对当地百姓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两年后离别三水时，满街百姓含泪为其送行，并立生祠祭祀。

连续两天流连官房，任荃这位古人在我心里丰满了许多。是的，每一个古村，每一处老屋，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当这些老房子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消失以后，那些古老的传说还会流传下去吗？

老人与古村

崔海波

久居古村的人对身边的景物大都习以为常，出门在外的游子对乡土文化又不甚了解。但是，对一个少小离家老大的花甲老人来说，故土乡音有一番别样的美丽。应义植的老家在章水镇蜜岩村，他十三岁参军，转业后在宁波市区工作，直至退休才有机会在老家蜜岩常住。

蜜岩村位于鄞西山区，2005年列入宁波市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村。应是蜜岩村的大姓。应义植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讲述乡土故事，这些故事有真实的，也有传说的，他为自己家乡有如此丰富瑰丽的历史文化积累感到自豪。真实的历史需要传承，民间传说源于生活，那里面包含了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值得记录流传。应义植觉得把这些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收集整理出来很有意义。

目标确立了，真正要付诸行动难度重重。应义植小学未毕业就去参军了，到部队后，虽然有机会到航空学院深造，但读的是飞机工程机械专业，与文史写作搭不上边。然而对乡土的眷恋和热爱激励着他，白天走村入户听老人讲述前尘往事，晚上回家学习电脑打字图片处理，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一张图一张图地发送，为搜集资料，他还学会了上网开博客。那段日子里，应义植随身携带的除了纸和笔以外，还有一台数码相机，把自己搜集到的文字材料写成一两篇长短不一的文章配上图片发到博客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点击量与日飙升，特别是一些在外地的蜜岩人纷纷留言，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乡情。

在蜜岩村委会的档案室里，静静地躺着一部古书，这是一部由理宗皇帝敕封的《蜜岩显爵应氏宗谱》，也是宁波地区唯一一部完整的应氏宗谱，宋明清以至民国时期都有修整，现藏本为1947年精修，屈指一算，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应义植看到后如获至宝，他一页页翻阅，一字字研究。有一回，应义植在与一位外地的应氏后人网上交流时得知有人从故宫博物院影印来上下册的《应氏人物家传资料》和《朱卷》，便想方设法联络上该人，通过资料交流获得《应氏人物家传资料》和《朱卷》。该书系清代科举应氏人物家传资料选集，对研究应氏历史、人物、源流、迁徙、官职、功绩很有价值，书中的十二位应姓人氏中有三位是四明应氏。应义植通过对这本秘籍和保存在蜜岩村档案室里的《蜜岩显爵应氏宗谱》的对比研究，发现明州应氏的始祖是应彪。

应彪为唐长庆年间明州刺史，现在蜜岩村边的蜜岩庙就是专门为他而建的。在宁波人的记忆里，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座桥。公元823年，应彪下令组织工匠在奉化江近三江口处，连舟十六艘，用篾索联结，上铺木板，架起了奉化江上的第一座浮桥，也就是灵桥最初的状态。

应义植说，这些年，为了搜集应氏资料，他北上南下，先后到访了四川、山西、河南以及省内的永康、义乌、慈溪等地，市内的应氏后裔聚居地慈城、东钱湖、下应就更不用说了，他用相机捕捉着行将消失的历史痕迹，用文字记录流传在民间的片言只语，至于枯燥的方志古书，更是一遍遍细细咀嚼，努力做到不遗漏精彩细节，《山海经》、《四明丛书》、《四明谈助》、《鄞县志》等史书成了他案头常用常新的工具书，至于蜜岩村里的古井、老屋、小巷、里弄，他闭上眼睛都能一一历数，就这样，在历史的瓶瓶罐罐、在故乡的老桥古宅、在山间的墓道小径中，他寻寻觅觅，量量测测，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挖掘着搜寻着。

在与越来越多的应氏后人的交流和共享中，应义植的资料积累越来越丰厚。一次，他从网上了解到慈溪有位方志收藏者手里有一本1936年版的《鄞县应氏宗谱》，比蜜岩村里的那本要早十来年，应义植记下地址兴冲冲地找上门去，却发现是一家商场，只好空手而归。但他天天记挂着那本宗谱，后来在文史部门朋友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终于看到了那本宗谱，他想高价买下来，无奈对方不肯出手，只同意拍照，应义植耐心地把一页页发黄的宗谱小心地拍下，回来后做成影印本，尽管如此，他也很满足了。

2011年，经过几年呕心沥血的搜集写作，二十余万字的《蜜岩千古情》出版了。这是应义植辛勤付出的成果和回报。

人文 总第5571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5179



77

其实爸爸骗了那些医生，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叠有关我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追悼会之后，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存放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妈、益生哥，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

在这批亲人中，爸爸历来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听大家讲话。

但是，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我的祖父，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毕竟，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而爸爸在人间坚持了那么久，苦熬了那么久。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外公、外婆也会

满意没有找错女婿。我叔叔，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而爸爸，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在“文革”灾难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爸爸多半会自杀，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但是，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还维持了全家。

爸爸见到了姨妈和益生哥，一定不知从何说起。姨妈太在乎自己儿子的成功了，而益生哥又把自己的麻烦看大了。爸爸能在人间坚持那么久，就是因为从来不看成败得失。他最后没有能过得了我这一关，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那股黑势力实在太强。我想他已有预感，就像他强过祖父，我也会强过他。因此，他是死于愤怒，而不是死于害怕。

因为我爸爸的突然离去，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事实证明，那些诽谤文章对我们的长辈有最直接的伤害，而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官办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我说，让我想一想。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的事物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文化素质”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50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但是，可能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

这是只有上海文人才想得出的聪明点子——

第一，向着“文史知识”的当红热点冲击“文史知识”，立即就能成为新闻焦点；

第二，凡是买过《文化苦旅》的读者都会去买一本他的“纠错本”，因此几天的发行量就能赶上《文化苦旅》十几年的结果，而且，很多刚刚听过我讲评文史知识的电视观众也会去购买；

第三，现代人既缺乏文史知识，又都很忙，书买来后看不明白就搁在一边了，没有时间去仔细查核；

第四，即使有人花时间去核查了，又写了反驳文章，也没有媒体刊登。因为媒体只报道名人出错，不会报道名人没出错。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